

俄羅斯的敦煌學： 評《敦煌學：第二個百年的研究視角與問題》及其他

榮新江

與聖彼得堡豐富的敦煌及相關領域的收藏品相比，俄羅斯的敦煌學，尤其是對敦煌漢文文獻的研究，可以說成就並不是非常突出。這並不是因為他們的學者不夠勤奮，事實上，他們擁有像孟列夫（L. N. Menshikov）那樣優秀的漢學家，而是在於蘇聯時期的科研體制、出版週期以及對中國的忽視，使得研究成果即使完成，卻遲遲不能出版，孟列夫的王梵志詩研究就是一例。進入 21 世紀，俄羅斯的敦煌學如異軍突起，大規模的考古收藏品展覽、學術討論會、各種形式的論文集一個接一個地展現在我們面前，這是俄羅斯東方學的集體榮譽，我想也是現任俄羅斯科學院東方文獻研究所（Institute of Oriental Manuscripts, Russian Academy of Sciences）所長伊麗娜·波波娃（I. F. Popova）教授辛勤工作、大力推動的結果。

擺在我們面前的這本厚重的論文集，即波波娃、劉屹主編《敦煌學：第二個百年的研究視角與問題》（*Dunhuang Studies: Prospects and Problems for the Coming Second Century of Research*，聖彼得堡，2012 年出版），就是這一系列成果的重要組成部分。這是 2009 年 9 月 3—5 日由俄羅斯科學院東方文獻研究所主辦、於聖彼得堡召開的一次敦煌學國際學術研討會的論文合集。記憶所及，這恐怕也是第一次在俄羅斯（包括蘇聯時期）召開的以敦煌學為主題的學術會議，其意義不僅僅在於展示俄羅斯學者的敦煌學研究成果，也使得俄羅斯成為敦煌學第二個百年中的一個重要舞臺。

之所以這樣說，在於本書的確是俄羅斯學者敦煌學研究的一次全面檢閱，也是世界各國學者對俄藏敦煌文獻或美術品的集中探討。我想這恐怕是會議主辦方精心的籌劃，也是波波娃教授的某種期待。遵循國際慣例，本書按照作者姓氏的字母順序排列論文先後次序，所以讀者不易一眼看出上述特色，因此，本文這裡將全部論文重新分成五組，即：1. 俄羅斯的敦煌學，2. 俄藏敦煌寫本和壁畫的研究，3. 胡語文獻研究，4. 漢文文獻與圖像的多視角觀察，5. 敦煌學史及其他，在每組內部再分類加以概述，間作簡要評述¹。

1. 俄羅斯的敦煌學

波波娃《俄羅斯科學院東方文獻研究所西域收藏品中的漢文文獻研究》（205—208 頁）介紹了俄藏西域收藏品中的漢文文獻。過去對西域出土的文獻大家關注的主要是胡語方面，往往忽視漢文文獻，事實上，這些文獻中大多數是中古西

¹ 本書所收論文正文用中、英文撰寫，中文論文附英文、俄文摘要，英文論文附中文、俄文摘要。在俄羅斯召開的會議不使用俄文，表明主辦者希望這次會議的成果更加國際化，同時也充分體現中文已經是敦煌學研究的主要用語。本文每篇論文的中文標題採用書中原文或摘要給出的標題。英文發表的文章，則括注英文標題。

域流行的漢文佛典，對於我們考察西域漢化佛教的流行情形深有價值。波波娃還特別介紹了兩件沒有刊佈過的漢文文書，一件是來自敦煌的《分書》文樣，另一件可能是吐魯番文書，係一份處理官牛死亡案件的牒文。

馬爾卡利塔·沃羅比約娃—捷霞托夫斯卡婭（M. Vorobyova-Desyatovskaya）、撒法拉利·索瑪赫馬多夫（S. Shomakhmadov）《俄藏敦煌收藏品中的〈金剛經〉殘片：描述、定年、注解》（*The Fragments of the Diamond Sūtra in the Russian Dunhuang Collection: Description, Dating, Comments*, 263—265 頁）對俄藏 601 件《金剛般若波羅蜜多經》殘片的綴合、歸類工作做了介紹，並探討了寫本的年代和傳播，特別提及當時僧人學習《金剛經》留有筆記，反映了敦煌地區僧侶接受佛學教育的情形。沃羅比約娃—捷霞托夫斯卡婭是中亞梵文、于闐文佛教文獻的研究專家，這篇文章在西域《金剛經》梵本流行的背景下論述了敦煌《金剛經》的流傳問題，視野宏闊，文章雖然很短，卻是敦煌佛典研究的一個典範。

伊莎貝拉·古列維奇（I. Gurevich）《敦煌寫本對研究唐代歷史語法和通俗文學（變文）的價值》（*Dunhuang Manuscripts as Source-material for Studies on the Historical Grammar and Vernacular Literature (bianwen) of the Tang Epoch*, 84—91 頁），一方面用敦煌本《六祖壇經》的語法和口語特徵來論證應當有一個 8 世紀的《壇經》原本，另一方面則仔細分析 Dx.285/I-III 三件寫本的性質，認為當屬於《太子須達拏經》之類的變文。古列維奇對變文的研究讓我們看到，孟列夫的學術在今天的俄羅斯得到了繼承。

謝爾蓋·克里昂什多爾內（S. Klyashtornyj）《敦煌及圖瓦突厥古文本中的摩尼教主題》（*Manichaean Motives in the Turkic Runic Texts from Dunhuang and Tuva*, 112—114 頁）在肯定前人關於敦煌古突厥文寫本《占卜書》（*irq Bitig*）的摩尼教性質的基礎上，進一步揭示距葉尼塞河岸不遠的圖瓦（Tuva）所發現的 Elegest-II 碑銘中的摩尼教因素。這是黠戛斯可汗侄子的紀功碑，其中有文句提到“月亮之子”，作者由此呈現出 9 世紀後半摩尼教在葉尼塞河到西域和中原地區廣泛流行的面貌。本文的前一半內容曾以“The Manichaean Text T II D and *irq Bitig* XIX”為題，發表在 2002 年柏林“重返吐魯番”學術研討會的論文集²，這次增補了有關葉尼塞碑銘的內容。克里昂什多爾內是突厥語銘文專家，著作等身，他對漠北摩尼教蹤跡的討論很值得注意。此前，O. Maenchen-Helfen 曾發表《西伯利亞的摩尼教徒》一文，指出約 7 世紀後半的葉尼塞岩畫中有摩尼的畫像，因而證明當時黠戛斯地區已存在摩尼教團³，但這種說法並沒有得到廣泛響應。9 世紀後半黠戛斯取代回鶻成為漠北地區的主人後，當地摩尼教的動向的確是十分重要的問題⁴。

² *Turfan Revisited – The First Century of Research into the Art and Cultures of the Silk Road*. Ed. by D. Durkin-Meisterernst et al. Berlin: Dietrich Reimer Verlag, 2004, pp. 147-148.

³ J. O. Maenchen-Helfen, “Manichaeans in Siberia”. *Semitic and Oriental Studies*. Ed. by W. J. Fischel. Berkeley-L. A., 1951, pp. 311-326. 中譯本見楊富學譯《西伯利亞岩刻所見黠戛斯摩尼教》，《中國北方民族歷史文化論稿》，甘肅人民出版社，2001 年，322—337 頁

⁴ 相關的討論，還有作者的另外一篇文章：S. G. Klyashtornyj, “Manichaean Monasteries in the Land of

莉莉婭·圖古舍娃 (L. Tugusheva) 《單詞的書寫形式對其發音的影響——以中世紀早期的回鶻文獻為例》(On the Influence of the Written Form of the Word on its Pronunciation (According to Early Medieval Uighur Texts), 261—262 頁) 討論伊朗宗教中的重要神祇名詞 Zervan 到 10—13 世紀回鶻文中發生的音變, 同時, 在西域強大的佛教勢力影響下, 其詞意也隨之變化。這是另一位俄羅斯突厥回鶻文專家從一個單詞出發討論中亞宗教混同與演變情形, 是語言學家以小見大的又一例證。

亞歷山大·佐林 (A. Zorin) 《俄羅斯科學院東方文獻研究所的藏文手卷收藏情況》(The Collection of Dunhuang Tibetan Texts Kept at the IOM RAS, 365—367 頁) 介紹了俄藏敦煌藏文寫本的入藏和編目情況。這些寫本大多數已經收入 1991 年出版的薩維茨基 (L. S. Savitsky) 《蘇聯科學院東方學研究所收藏敦煌藏文寫卷注記目錄》中, 即有 202 件《無量壽宗要經》、10 件《般若波羅蜜多心經》、1 件中亞婆羅謎字音表、1 件不知名佛經⁵。佐林指出, 最後兩件不是敦煌寫本, 一件來自西域, 一件可能來自黑城。他在薩維茨基之後負責藏文寫本的編目工作, 又找到 5 件過去“遺失”的藏文寫本, 本文對這些佛經做了簡要的考釋。

葉甫根尼·克恰諾夫 (E. I. Kychanov) 《敦煌作為西夏王國疆域的一部分 (982—1227)》(Dunhuang as Part of the Tangut Empire 982-1227, 127—130 頁) 考察了敦煌併入西夏王國的年代及其所處的邊疆地位, 強調當地漢人、党項人、回鶻人、藏人之間和平共處的關係, 特別是西夏時代的敦煌作為佛教文獻印刷和傳播中心, 以及作為漢文化的組成部分對周邊特別是西夏的影響。這篇文章是西夏研究的權威對西夏時期的敦煌所做的概述, 文字不長, 但十分全面。作為親歷整個 20 世紀西夏研究的學者, 克恰諾夫還在文中回憶了中蘇論戰、“文革”時期的西夏研究以及他與中國學者的聯繫, 這些也是珍貴的敦煌學史資料。

基拉·薩瑪秀克 (K. Samosyuk) 《西夏及元朝的黑水城、莫高窟、榆林窟繪畫藝術風格》(The Artistic Style Paintings from the Xi-Xia and Yuan Dynasties in Khara-Khoto, Mogaoku and Yulinku, 222—229 頁) 以圖文並茂的形式, 區分出黑水城、莫高窟、榆林窟等地不同的繪畫群體, 並分析了各自的藝術風格特色, 從而指出在這片並不大的地域中畫家群體之間的互相關聯與彼此獨立。俄羅斯收藏的黑水城出土繪畫品一直是研究西夏藝術的主要源泉, 隨著莫高窟、榆林窟西夏時期壁畫細部圖版的陸續發表, 西夏藝術的研究也正在日新月異。

索羅寧 (K. Solonin) 《西夏文禪宗文獻及其內容特色》(230—237 頁) 是以中文發表, 篇幅相對較長的一篇, 從梳理西夏佛教文獻研究中遺留的問題出發, 概述了西夏佛教的來源與背景, 然後進入正題, 把現存西夏文文獻中的禪宗文獻分為“共同禪文獻”、“華嚴以及華嚴禪有關文獻”、“純的禪宗文獻”、“不確定的禪宗文獻”四類, 並逐一解說, 又就其內容做了初步探討, 最終指出, 西夏禪宗

Arghu”, *Studia Manichaica IV. Internationaler Kongress zum Manichäismus, Berlin, 14.-18. Juli 1997*, ed. R. E. Emmerick, W. Sundermann and P. Zieme, Berlin: Akademie Verlag, 2000, pp.374-379.

⁵ 參看張廣達《評〈蘇聯科學院東方學研究所收藏敦煌藏文寫卷注記目錄〉》,《漢學研究通訊》第 10 卷第 3 期, 1991 年, 184—187 頁。

沒有形成自己獨立的宗派，其學說主要和契丹地區的“華北佛教”以及吳越地區的佛教有關。作者提出的西夏禪宗來源的“契丹說”很有新意，從當時西夏與遼、宋之間的關係來說，這一推論是很有見地的。

尼古拉·普切林（N. Pchelin）《吐魯番佛教寺院壁畫之象徵意》（*The Symbolism of the Murals from the Buddhist Monasteries of Turfan*, 200—204 頁）通過對比吐魯番吐峪溝和柏孜克里克石窟壁畫中的虎、雪豹、鵝、鴨、陽鳥等動物圖像與其他地區同類圖像，進而說明古代高昌居民與中原、印度及中亞居民的聯繫，並由此強調吐魯番古代宗教文化的多元合一特性。動物和宗教的關係越來越受到關注⁶，本文和此前吐魯番佛寺壁畫的文章著眼點不同，這種從新的視角來觀察石窟壁畫的嘗試，值得在今後研究中推而廣之。

弗拉基米爾·米亞斯尼科夫（V. Myasnikov）《俄羅斯科學院在敦煌考察與研究中的作用》（*The Role of the Russian Academy of Sciences in the Exploration of the Dunhuang Complex*, 180—184 頁）簡要介紹了 19 世紀末、20 世紀初俄國科學院對新疆、蒙古高原的多次系統考察，以及所獲考古、文獻材料對包括敦煌學在內的學術研究的重要意義。

以上 11 篇俄羅斯學者的文章在整本文集中所佔篇幅並不多，但涉及西域、敦煌、突厥、回鶻、吐蕃、西夏、吐魯番等地域範圍，內容涵蓋唐宋時代官私文書、佛教經典和禪宗文獻、變文、敦煌與突厥的摩尼教、回鶻文詞彙、藏文佛典、西夏時期的敦煌、西夏的禪宗文獻、西夏藝術特徵、高昌壁畫的意義以及俄國早期探險史等主題，表明俄羅斯敦煌學雖然人數不多，但涉獵面十分廣泛。這些課題的集中發表，也從一個側面展現了俄羅斯敦煌學（包含與之相關的突厥學、藏學、西夏學、佛教藝術史等學科）的開闊視野和蓬勃發展，我想這是敦煌學今後得以持續發展的正路。

2. 俄藏敦煌寫本和壁畫的研究

對於中、日學者來說，從遙遠的東方飛到聖彼得堡參加敦煌學會議，首先想到的，應該就是做關於俄藏敦煌文獻的研究。俄藏敦煌文獻是世界幾大敦煌寫本收集品中晚近整體刊佈的一批資料，因此往往可以提供給研究者全新的素材。不過，俄藏敦煌文獻一般比較破碎，所以對此前敦煌學研究並無大的突破，多是拾遺補缺。當然，敦煌文書的研究有時不在於寫本文字的多少，更在於內容是否有研究價值。

在俄藏敦煌文獻的整理方面，王三慶《〈俄藏敦煌文獻〉應用文書研究》（268—273 頁）對這部大型圖錄的標目加以訂正，排除誤作類書、書儀和齋願文獻的寫本，改定真正屬於這三類文獻的卷子，最後提示了俄藏敦煌文獻的價值。其中個別寫本的定名，如誤題“書儀”的Φ.342 應當是《齋琬文》，筆者已作過辯證⁷。本文對三類應用文書的系統考察，為這些文獻的總和整理與研究提供了很好

⁶ 參看陳懷宇《動物與中古政治宗教秩序》，上海古籍出版社，2012 年，以及孫英剛的書評，劉玉才主編《國際漢學研究通訊》第 6 期，北京大學出版社，2013 年，397—406 頁。

⁷ 榮新江《書評：〈俄藏敦煌文獻〉第 1—5 冊》原載季羨林等編《敦煌吐魯番研究》第 1 卷，北京大學出

的資料。玄幸子《俄藏敦煌文獻錄文與定名——整理過程中發現的幾個問題》(95—101頁)針對《俄藏敦煌文獻》第11冊以下沒有定名的情況,選擇第12冊中一些佛典和個別道經、書儀、放妻書,先做錄文,再加以比定,給出俄藏敦煌文獻整理的基本範式。周西波《俄藏失題敦煌道經略考》(22—26頁)則是在大淵忍爾、王卡比定的基礎上,對三種俄藏敦煌道經寫本的性質判定和經名辨正。

在具體問題的研究方面,鄭阿財《敦煌佛教講經資料輯考與實況重建——從俄藏Φ.109寫卷論八關齋與俗講之關係》(17—21頁)根據同一書手連續抄寫《押座文》、《八關齋戒文》、《發願文》的情形,指出該文書是八關齋會所用的底本,《押座文》的出現,表明齋會中有俗講的活動⁸。辻正博《俄羅斯科學院東方文獻研究所藏〈唐名例律〉殘片淺析——關於Дx.8467的考證為主》(257-260頁)將Дx.8467比定為《唐名例律》,並與已知的Дx.1391綴合。馮培紅《Дx.1335〈歸義軍都虞候司奉判令追勘押衙康文達牒〉考釋》(49—54頁)對相關牒文做了十分透徹的解說,也為歸義軍與伊州回鶻的關係、伊州回鶻之於西州回鶻的獨立性等問題提供了證明。鄧文寬《俄藏敦煌和黑城漢文曆日對印刷技術史研究的意義》(33—34頁)重新強調了俄藏敦煌印本Дx.2880《唐大和八年甲寅歲(834)具注曆日》和俄藏黑城出土活字印本《西夏光定元年辛未歲(1211)具注曆日》在印刷技術史上的價值,並討論早期印刷品都是曆日的原因。張乃翥《俄藏敦煌遺書若干殘卷與中古中原文化之西漸》(333—338頁)以官文書及中原典籍寫本來說明中原文化傳播敦煌的情形。但文章沒有留意前人相關研究成果,對一些文本的定性不夠準確。

藝術史方面,山部能宜《以Дx.316為中心的〈觀經變相〉的分析——再探討美術和文獻的關係》(An Analysis of the *Guanjing bianxiang* Focusing on Дx-316: A Reconsideration of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Art and Text, 299—309頁)考察了艾爾米塔什博物館藏《觀經變相》圖卷(Дx.316)及相關的敦煌壁畫,指出這些變相圖並非根據經典繪製的,而是描繪自此前存在的圖樣,因此其內容往往與經文相乖戾。張惠明《柏孜克里克石窟〈金光明經變圖〉中的〈懺悔滅罪傳〉故事場面研究——兼談艾爾米塔什博物館所藏奧登堡收藏品Ty. 575號相關繪畫殘片的拼接》(A Study of the Story of the *Penance and Elimination of Sins* in the *Golden Light Sūtra* Illustration from the Bezeklik Caves (Focusing on Ty-575 Fragments of the Hermitage Collection, 321—332頁)的研究對象是吐魯番地區的壁畫,對相關壁畫殘片進行了復原與訂正,並詳細探討了圖像中的張居道故事,還把壁畫內容還原至11世紀前期西州回鶻的佛教背景中,討論回鶻人寫經滅罪和懺悔的思想⁹。

此外,有關敦煌編號中的吐魯番文書,王素《關於俄藏〈揖王入高昌城事〉Дx.2670v文書的幾個問題》(274—277頁)在吳震研究的基礎上,對相關條目加

版社,1995年,372頁。

⁸ 本文收入《鄭阿財敦煌佛教文獻與文學研究》,上海古籍出版社,2011年,217-233頁。

⁹ 本文中文本載《故宮博物院院刊》2011年第3期,55-70頁,唯有些圖版太小,不如此文編排精細。

以解說，并擬名為《沮渠氏北涼史事摘抄》¹⁰。不過這只是今人給予的名稱，作為典籍，它的原名不會如此。對於黑城出土的漢文文書，孫繼民《俄藏宋保安軍金湯城文書研究》（243—248 頁）討論了寫於北宋宣和七年（1125）的六件金湯城文書及相關問題。近年來，孫繼民和他的團隊對黑城文書的研究有很多推進，2012 年 3 月出版了《俄藏黑水城漢文非佛教文獻整理與研究》三冊（北京師範大學出版社），本文也收錄其中（866-881 頁）。

3. 胡語文獻研究

胡語文獻寫本是俄羅斯收集品的重要組成部分，特別是科茲洛夫在黑城發現的西夏文文獻，在各國類似收集品中，不論質量還是數量都首屈一指。這裡把有關俄藏胡語文獻和有關胡語的其他研究論文作一集中介紹，以此呈現敦煌學這一學術領域的豐富成果。

回鶻文寫本研究是其中的重頭戲。阿不都熱西提·亞庫甫《〈傅大士頌金剛經〉的回鶻語譯文與同經漢文校勘本的確立》（*Old Uighur Translations of the Fu-Vajracchedikā and the Establishment of a Critical Chinese Edition*, 293—298 頁）在前人整理研究基礎上，依據德藏吐魯番回鶻文和漢文寫刻本，將回鶻文本《傅大士頌金剛經》分成經偈本和偈頌本，後者包含一些漢文本沒有的頌，可以幫助確立新的漢文校勘本。笠井幸代《一種古突厥語〈維摩詰經〉注疏概觀》（*The Outline of the Old Turkish Commentary on the Vimalakīrtinirdeśa Sūtra*, 106—111 頁）介紹了回鶻文《維摩詰經》注本，并討論了其依據的漢文原本和翻譯中的增補情形。聖莫娜·克里斯特亞娜·拉施曼（S.-C. Raschmann）《聖彼得堡東方文獻研究所所藏古代突厥語〈十王經〉殘片》（*The Old Turkish Fragments of The Scripture on the Ten Kings in the Collection of the Institute of Oriental Manuscripts, RAS*, 209—216 頁）綴合、復原了俄藏回鶻文《十王經》圖文本殘片的位置，并與德藏、日藏殘片加以對比，是作者和茨木（P. Zieme）合作整理所有該經回鶻文殘卷的成果之一。茨木《吐魯番地區回鶻語中關於敦煌發現的禪文獻的音譯及翻譯》（*A Chinese Chan Text from Dunhuang in Uighur Transcription and in Translation from Turfan*, 361—364 頁）是作者近年來整理研究受敦煌通俗佛教文獻影響的高昌回鶻佛教文獻的又一成果，他在龐大的柏林吐魯番收集品中找出吐峪溝出土的漢文《十二時》（Ch.1421v）、柏孜克里克出土的回鶻文音譯漢文《十二時》（U.9006）以及回鶻文譯本（Ch/U.6928），勾勒出一幅高昌回鶻一步步接受漢文化的全景畫面¹¹。松井太《敦煌出土回鶻文曆占殘片》（*Uighur Almanac Divination Fragments from Dunhuang*, 154—166 頁）是對美國普林斯頓大學東亞圖書館所藏三件和敦煌莫高窟北區新發現的一件回鶻文曆占文書殘片的轉寫、翻譯、註釋，進而考察了蒙元時期回鶻、西夏和中原的文化交流。

在西夏文方面，聶鴻音《〈明堂灸經〉的西夏譯本》（190—195 頁）是對俄藏

¹⁰ 本文又載《吐魯番學研究》2009 年第 2 期，19—27 頁。

¹¹ 本文中文摘要將吐峪溝誤作“圖尤克”，柏孜克里克誤作“彼吉克里克”。

黑城出土西夏文《明堂灸經》的規範轉寫、翻譯和校注。王培培《〈維摩詰經〉的西夏譯本》(266—267頁)對比俄藏黑城出土西夏文本的惠宗初譯本和仁宗校譯本的不同。孫伯君《西夏俗文學“辯”初探》(238—242頁)研究了黑城出土西夏僧寶源所編《賢智集》中“辯”類文學作品,并翻譯了第一篇。

此外,還有杜爾金(D. Durkin-Meisterernst)《柏林吐魯番收集品中的粟特語文獻整理和研究現狀》(Current Work on the Sogdian Texts in the Berlin Turfan Collection, 35—38頁)一文,介紹了有關編目、刊佈和摩尼教詞典計劃中的粟特文部分的進展。岩尾一史《吐蕃統治敦煌時期的寫經目的》(The Purpose of Sūtra Copying in Dunhuang under the Tibetan Rule, 102—105頁)在考察吐蕃寫經的特徵後,指出抄寫藏漢文《無量壽宗要經》在於為贊普祈求長生或冥福,用紙不甚規範,抄寫藏文《十萬頌般若經》或漢文《大般若經》則為補充各地經藏,因此格式謹嚴。近年來,有關敦煌寫經的抄寫過程、形制、功用等方面的研究有很多進步,與此同時,敦煌漢藏文寫本對寫本時代書籍史的相關研究,提供了不可多得的例證。

4. 漢文文獻與圖像的多視角觀察

敦煌學中的漢文寫本研究相對比較成熟,這次會議中也占較大比重。在佛教文獻方面,趙和平《武則天“御制”〈金剛般若經序〉及〈妙法蓮華經序〉再研究》(339—344頁)據新得到的材料,復原兩篇御制序文,并重新統計了已知兩種宮廷寫經的數量。需要指出的是,其中中國文物(一處誤作“文化”)研究所藏《法華經序》,在《中國文化遺產研究院藏西域文獻遺珍》(中華書局,2011年)一書中未見其影。郭麗英《從〈佛頂尊勝陀羅尼經〉談敦煌寫經壁畫及相關石刻史料》(Dunhuang Sūtras' Copies and Associated Elements: Case Studies of the *Foding zunsheng tuoluoni jing*, 115—126頁)系統考察了該經的翻譯、流傳以及敦煌寫本和各地留存的石刻文本,包括壁畫中的相關表現,以此為例特別強調敦煌寫經在佛典版本中的價值。佛德力·吉海(F. Girard)《敦煌地論宗文獻中的三名法的體、相、用和〈大乘起信論〉》(The Trinomial Substance [*ti* 體], Signs [*xiang* 相] and Activity [*yong* 用] in Some Dunhuang Manuscripts Related to the Dilun School and the *Treatise on the Act of Faith in the Great Vehicle* [大乘起信論], 66—74頁)是對S.4303和S.613兩種6世紀中葉產生的地論宗文獻的研究,分析了其對《大乘起信論》和聖德太子《三經義疏》的影響。楊富學《摩訶衍禪法對吐蕃佛教的影響》(315—320頁)對前人研究成果做了全面的概述,然對1992年David Seyfort Ruegg出版《比較中觀佛性、心識和漸悟問題:論佛教在印度和西藏的傳播和接受》以後的研究成果則吸收不夠,這方面可以參看沈衛榮《敦煌古藏文佛教文獻、塔波寺文書和〈禪定目炬〉研究:對新近研究成果的評述》的相關介紹¹²。此外,林仁昱《〈佛母經〉的類型與流行意義研究》(131—136頁)系統整理

¹² 樊錦詩、榮新江、林世田主編《敦煌文獻·考古·藝術綜合研究——紀念向達先生誕辰110周年國際學術研討會論文集》,中華書局,2011年,339—353頁。

了兩類《佛母經》。

在通俗佛教文獻方面，太史文（S. Teiser）《敦煌齋文文書形制研究》（*A Codicological Study of Liturgical Manuscripts from Dunhuang*, 251—256 頁）用文書形制學的方法，將齋文分作單頁、經卷、冊子、合訂本四類，討論它們與敦煌當地社會結構及民眾信仰的關係。朱鳳玉《從原生態論敦煌變文之抄寫與閱聽問題》（27—32 頁）依原卷形態觀察變文文本，區分為說唱者預撰的底本、綱要，聽眾的口頭記錄，手抄、轉寫以及供閱讀讀物等不同文本類型，考察變文在口頭與書面文學中的表現形式，以及講唱者、作者、抄寫者和聽眾、讀者之間的互動關係¹³。這也是一篇將寫本形態與內容結合起來討論的佳作。郝春文《讀敦煌文獻劄記（二則）》（92—94 頁），一是S.1725v《沙州祭文并祭祀所需物品牒抄》與沙州的祭祀活動，二是S.1473v“禮懺文摘抄”之定名¹⁴。

有關道教的研究不多，劉屹《S.4226〈太平部卷第二〉與〈太平經〉的“再出說”》（147—153 頁）總結中日學者對《太平經》成書年代的不同看法，以敦煌本《太平部卷第二》作為證據，指出太平經正文仍可視為漢代思想的體現。

在文學方面，顏廷亮《關於吐蕃佔領時期敦煌文學的新思考》（310—314 頁）探討吐蕃時期敦煌文學涵蓋的範圍，並評價其整體水平。這是敦煌學中一個可喜的嘗試，但筆者以為，該文對古藏文文獻中文學作品的估計不足，對相關的研究成果也缺乏瞭解。與文學相關的民俗文化方面，柴劍虹《敦煌古代體育與歲時節日文化》（14—16 頁）是兩個研究領域的結合，強調體育活動的文化特性。

在語言學方面，有高田時雄《古代西北方言的下位變體》（*Phonological Variation among Ancient North-Western Dialects in Chinese*, 249—250 頁），永田知之《敦煌書儀語言淺析——以與日本傳世書簡、詩序的比較為中心》（185—189 頁）。筆者於此是外行，不敢置評。

在歷史方面，許全勝《西陲塢堡與胡姓家族——新獲吐魯番出土文獻的若干問題》（284—292 頁）對古代高昌地區的塢堡和胡人生活情況提出若干看法，並對《新獲吐魯番出土文獻》的相關釋文提出改訂意見。作者對於整理文書的一些看法和原整理組的原則不同，比如整理組遵一般原則不補的文字，作者都一一羅列出來，事實上，這些在整理過程中整理組成員發表的單篇相關論文中都有訂補，作者應當做相應提示。無論如何，這是筆者看到的對拙編《新獲吐魯番出土文獻》最嚴厲的批評，許多意見我們應當接受或加以考慮。吳麗娛《再談私書中的“狀”與別紙》（278—283 頁）討論了私書的形式、用語及其與公狀、別紙的關係，並由唐宋政治體制演變和官僚社會發展的背景中去解釋其變化的原因。高啟安《敦煌文獻中羊的稱謂研究——以“殺羊為中心”》（60—65 頁）根據《齊民要術》及敦煌吐魯番文書的上下文，給出各種羊的正確稱謂，並釐清了此前誤解。赤木崇敏《曹氏歸義軍節度使的譜系》（*The Genealogy of the Military Commanders of the Guiyijun from Cao Family*, 8—13 頁）把曹氏與甘州回鶻和于闐王國的婚姻關

¹³ 本文收入《朱鳳玉敦煌俗文學與俗文化研究》，上海古籍出版社，2011年，107-125頁。

¹⁴ 本文收入《郝春文敦煌學論集》，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年，303-314頁。

係加入到世襲表中，區分為回鶻和于闐兩派，認為兩派之間曾圍繞節度使的繼承展開激烈鬥爭。這是很有新意的看法，至於具體的世襲和相關文書的解說，恐怕還需要斟酌。坂尻彰宏《戊寅年五月十日歸義軍節度使下壽昌副使等防禦南山攻擊帖（P.3835v7）》（*An Order of the Governor-General of Guiyijun about an Attack of Upland Nomads: P.3835v7*, 217—221 頁）通過對文書的整理、校錄、翻譯、註釋，探討歸義軍與南山遊牧民的關係以及如何防備遊牧民對綠洲地區的攻擊問題。

在藝術史方面，朱天舒《敦煌第 272 窟與“一佛五十菩薩”瑞像》（345—350 頁）提出屬於北涼的莫高窟 272 窟的主尊不是彌勒，而是阿彌陀像，他與壁畫上的五十菩薩構成一幅完整的印度瑞像圖。按敦煌研究院編《莫高窟第 266~275 窟考古報告》第一卷第一分冊（文物出版社，2011 年 8 月）244、247-248 頁認為主尊像是下生成佛說法的彌勒這一傳統說法是有根據的。劉惠萍《假借與嫁接：敦煌佛教藝術所見日、月圖像與中國神話》（137—146 頁）梳理敦煌壁畫中的日月圖像後，指出這些圖像既假借自中國傳統的神話圖像，還嫁接了印度佛教藝術傳統。孟嗣徽《十一曜星神圖像考源——以西夏時期〈熾盛光佛與十一曜星神宮宿圖〉為例》（167—179 頁）描述了西夏時期《熾盛光佛與諸曜星神宮宿圖》，對圖像和星神名稱的來源作了細緻的考證，指出西夏星神崇拜中彙聚了希臘、波斯、印度、中國各種文化要素。

5. 敦煌學史及其他

過去為人忽略的敦煌學史，現在越來越成為敦煌學研究者津津樂道的話題。過去的敦煌學史大多都從藏經洞開啟說起，朱玉麒《清代西域流人與早期敦煌研究——以徐松與〈西域水道記〉為中心》（351—360 頁）將研究視線上溯到清道光年間，介紹西北與地學巨擘徐松著作中有關敦煌山川河流的描述及其對當地所存碑銘的錄文與考釋，重新評估了徐松之於敦煌學的意義。高奕睿（I. Galambos）《斯坦因作品最早中文翻譯的發現》（*A Forgotten Chinese Translation of the Preliminary Report of Aurel Stein's First Expedition*, 55—59 頁）指出中國國家圖書館藏英人士丹《游華訪古記》是譯自斯坦因 1902 年發表的第一次中亞探險《簡報》，這是新疆巡撫饒應祺在 1902 年 7 月請人翻譯的。作為斯坦因的同鄉，作者極力強調譯文跋語對斯坦因考古行為的讚揚，但檢視原文，似乎也沒有特別表彰的意思。高杏佛（C. Gumbrecht）《“至高無上之讚譽”——德國吐魯番考察隊成員的一封致謝信》（“Beyond all praising”: a Letter of Thanks from the German Turfan Explorer, 75—83 頁）刊佈了柏林東方藝術博物館檔案室保存的一份德國教育部長的報告，其中逐一致謝為德國第一次吐魯番考察提供幫助的清朝人士，作者根據檔案和探險隊報告對這些人做了詳細的考證。利用檔案來研究敦煌學史乃至整個西域考古探險史，是今後敦煌學的重要研究方向之一。

此外，落合俊典《李盛鐸舊藏敦煌本的真偽》（*The Authenticity of Li Shengduo's Old Corpus of Dunhuang Manuscripts*, 196—199 頁）根據武田科學振興財團杏雨書屋出版的《敦煌秘笈目錄冊》，翻譯介紹了杏雨書屋所藏 760 號敦

煌文獻的基本情況，并指出目錄定題等方面的問題。又談到其中 432 號原屬李盛鐸舊藏品的真偽問題，根據作者本人對羽田亨紀念館所藏照片中部分寫本的研究，確定都是真本。筆者 1997 年就發表過幾乎同樣題目的文章，即《李盛鐸寫卷的真與偽》¹⁵，其英文本“The Li Shengduo Collection: Original or Forged Manuscripts?” 遲至 2002 年刊出¹⁶。遺憾的是，作者巨細無遺第羅列了自己有關李盛鐸舊藏寫本的研究，卻隻字不提十多年前的拙文！然而此文並未在拙文之外提出任何新鮮的材料和觀點。有關李盛鐸藏卷均為真本的結論是筆者自認對敦煌學的貢獻，因此有必要在此略加提示。

最後，用科學手段從事敦煌研究的還不是很多，江南和幸、坂本昭二、岡田至弘、河野益近《中國中亞社會文化生活史研究——通過古文書用紙質料科學分析》（*Approach to the History of Social and Cultural Life in Medieval China and Central Asia through the Scientific Analysis of Paper*, 39—48 頁）通過高解析度顯微鏡觀察與植物學分析，指出高昌回鶻製造的蘆葦紙是對中亞社會文化生活的重要貢獻。

6. 小結

本次會議的主題是“敦煌學：第二個百年的研究視角與問題”，對此，編者在序言中總結了 20 世紀敦煌學在專題研究、文獻編目和圖版刊佈等方面取得的巨大成績，並指出，進入 21 世紀，應當“使用新的模式和方法觀察和理解敦煌文獻，以及對敦煌文獻進行編目”，“對已經公佈的敦煌文獻進行全面的深入研究”，“二十世紀出版的目錄，於當時較為完整，如今急需更正、補充”，還有“基於敦煌文獻和中亞其他地區的材料研究所產生的大量優秀論著，也為撰寫這些地區歷史文化的通論性著作提供了可能”。筆者非常認同這些看法。敦煌學各個領域的深入研究已經取得豐厚的成果，但很多基礎性的工作並沒有完成，比如我們沒有一部敦煌寫本分類目錄，讓更廣泛的研究者知道敦煌文獻都有哪些內容，某種文獻都有多少寫本；雖然我們都在談敦煌佛典、佛教壁畫，但我們還沒有一部“敦煌佛教史”。因此，編目和通論性的著作仍是 21 世紀敦煌學繼續開展的工作。對於序言所說的“新的模式和方法”，編者沒有做進一步的論證，我想敦煌學應當採用歷史、宗教、文學、藝術等多學科對話的綜合研究方法，積極開拓新的研究視角，比如從地域社會、環境、性別、書籍史等視角，對敦煌文書進行重新審視與考辨，這必將進一步拓寬敦煌學的研究領域，更新敦煌學的面貌。

7. 附論其他相關論著

評論這部文集，不能忽略幾種大致同時出版的有關俄羅斯敦煌學的著作。首

¹⁵ 《敦煌學輯刊》1997 年第 2 期，1—18 頁。筆者相關的論文還有《追尋最後的寶藏——李盛鐸舊藏敦煌文獻調查記》，劉進寶、高田時雄主編《轉型期的敦煌學》，上海古籍出版社，2007 年，15—32 頁。以上兩文均收入拙著《辨偽與存真——敦煌學論集》，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 年。

¹⁶ *Dunhuang Manuscript Forgeries* (The British Library Studies in Conservation Science 3). Ed. by Susan Whitfield, London: The British Library, 2002, pp. 62-83 + pl.1.

先是高田時雄編《涅瓦河邊談敦煌》(*Talking about Dunhuang on the Riverside of the Neva*) (京都大學人文科學研究所, 2012年)。這本書是2010年9月3日在聖彼得堡召開的“涅瓦河邊談敦煌”圓桌會議的論文集, 收錄9篇俄、日兩國學者的論文, 俄國學者用英文撰稿, 日本學者用中文或英文寫作, 英文論文有中文摘要, 中文論文有英文摘要, 沒有使用雙方的母語俄文和日文, 同樣表現了主辦方對國際性的追求。以下按文章發表順序對所收論文做一簡要評介。

前半是俄國學者的論文。葉甫根尼·克恰諾夫《西夏國的水利灌溉》(*Irrigation in the Tangut State of Xi Xia (982-1227)*, 1—19頁)指出, 西夏王國不僅擁有大量農耕土地, 還有一套管理水利灌溉的法則, 文章主體是翻譯西夏文《新法》有關水利的24個條文。波波娃《俄羅斯科學院東方文獻研究所藏SI O/32 (4112)號與Дх.18923號文書考釋》(*Remarks on the Documents SI O/32 [4112] and Дх.18923 of the IOM RAS Collection*, 21—38頁)對兩件有關官畜死亡或遺失的牒文做了描述、翻譯和註釋。前者是吐魯番文書, 在《敦煌學: 第二個百年的研究視角與問題》所收波波娃的中文論文中也有簡單討論, 這裡參考馬伯樂所刊吐魯番出土長行馬文書做了更細緻的論述, 並附有彩色圖版; 後者是和田出土文書, 作者在張廣達先生和筆者論文的基礎上, 結合唐代典制加以解說。亞歷山大·佐林《誤入敦煌文書中的一件罕見藏文寫本》(*On an Unique Tibetan Manuscript Mistakenly Included into the Dunhuang Collection*, 39—50頁)指出這件藏文寫本可能來自黑城, 其中抄寫了24篇文獻, 有些出自12世紀的西藏譯經師兼瑜伽師吉祥老(Dpal Rga lo), 其中有關毗濕奴那羅辛哈(Vishnu Nalasimha)的儀式文書不見於其他文獻, 本文做了詳細的介紹。

後半是日本學者的文章, 赤尾榮慶《俄藏寫本發願文斷片SI-3119/2與SI-3119/1再考》(*Reexamining the Manuscript Fragments of a Prayer SI-3119/2 + SI-3119/1*, 51—57頁)在為“絲綢之路古文字巡禮”展覽圖錄所寫詞條的基礎上, 指出這兩個殘片組成的發願文是為一次涅槃法會撰寫的, 但遺憾的是對願文作者左祖興等人一無所知。筆者承裴成國博士見告, 這件文書上的“尊子興”見於1997年吐魯番洋海1號墓所出《闕氏高昌永康年間(466—485)供物、差役帳》第四斷片第2行和第二二斷片第3行。由此推測, 第一七斷片第12行的“口祖興”或許就是“左祖興”, 同一帳歷中還有左首興(一八/1)、左巳興(二三/4)、左相(一〇/4)、左沙彌(一五/10)、左雙德(一五/14, 三一/11)、左豬奴(一六/7)、左養安(二三/8)、左建祖(二五/10)¹⁷, 發願文和這件永康年間的帳歷文字寫法接近, 因而表明左姓是當地常見的姓氏。作者雖然舉證此發願文中的一些字體與《且渠安周碑》(449年完成)相似, 卻將年代放在6世紀。我們從永康年間的帳歷來判斷, 此發願文應當是5世紀後半的寫本, 這和《安周碑》的年代也比較相符。

落合俊典《杏雨書屋藏〈佛說行七行現報經〉真偽之考察》(59—64頁)指出這部小乘別生經在《開元錄》卷十六的“不入藏錄”中有記錄, 而日本奈良時

¹⁷ 榮新江、李肖、孟憲實主編《新獲吐魯番出土文獻》, 中華書局, 2008年, 129—145頁。

期有抄本。作者以羽 098 號寫本為底本，以七寺本、聖語藏本、高麗初雕本作了校勘。從經典製作的角度，論證這部小經並非偽造。這是屬於李盛鐸的舊藏品，作者這篇個案研究其實是要支撐他上述論文關於李盛鐸藏卷沒有偽品的看法。筆者當然贊同這一點，對於作者所述奈良朝寫本出自長安的見解也深表贊同。的確，敦煌寫本也有不少來自長安，故此與奈良寫本有時候沒有明顯差別。

永田知之《Дx.10839〈鄭虔殘札〉雜考——“搨書”與“真跡”之間》（65—80 頁）結合文獻材料，對盛唐書畫家、詩人鄭虔的書札做了透徹的解說，並由此判斷當時民間對於書法真跡的追求，以及搨書的方法和搨本與臨本的不同等問題。這件珍貴的鄭虔書札很早就被吳其昱先生慧眼檢出，發表在《列寧格勒所藏敦煌寫本概況》中¹⁸。此後學人多從文學的角度看待此札，而本文則從書跡的角度加以討論，很有清新之感。

辻正博《Дx.09331 唐律寫本殘片小考》（81—90 頁）根據對原卷的考察，發現史睿判斷為唐律寫本的Дx.09331 背面有官印痕跡，惜文字只讀出“□州□/□□之印”，而沒敢遽然判斷是“涼州都督府之印”還是“西州都督府之印”，作者推測該殘片如果屬於敦煌出土寫本，則官印應該是涼州的；如果是吐魯番出土的，則官印應該是西州的。檢史睿《新發現敦煌吐魯番唐律、唐格殘片研究》一文，提到此官文書行數與吐魯番出土大谷 8098《唐律·擅興律》殘片每行 13 至 14 字相近¹⁹。雖然他沒就此說是吐魯番文書，但顯然有這種傾向。筆者曾指出，天寶年間官頒道經寫本，不論是敦煌出土的《老子道德經》（Дx.0111+Дx.0113）²⁰，還是吐魯番出土的《太上洞玄靈寶無量度人上品妙經》（MIK III 7484），其背面紙縫都鈐有“涼州都督府之印”²¹。因此，即使是吐魯番出土文書，也可能鈐上“涼州都督府之印”，因為在相當一段時間裡，西州是屬於涼州都督府管轄範圍的。

玄幸子《再論〈新菩薩經〉、〈勸善經〉以及〈救諸眾生（一切）苦難經〉——以Дx.05155 為綫索》（91—109 頁）討論了敦煌、吐魯番寫本三種經文的產生、流傳和交互影響，並將俄藏敦煌收藏品提供的新寫本全部錄文。這類文書是討論民間信仰的寶貴資料，不僅在敦煌、吐魯番地區流行，甚至也傳播到龜茲、于闐等地，新發現的和田出土《觀世音菩薩勸攘災經》也屬於同類文本²²。

高田時雄《丁類〈五臺山讚〉小注》（111—122 頁）是按照杜斗城的分類，以 P.4597 和 Дx.788 補充丁類原有的一件寫本，並做了新的校錄，最後討論了其中提到的寺院，並據以將丁類讚文的創作年代定在 699—767 年之間，早於其他各類《五臺山讚》。

這本篇幅不大的論文集也可以看作是世紀俄羅斯敦煌學的組成部分，其前半是俄羅斯學者的論文，後半是以高田時雄教授為核心的日本學者關於俄藏敦煌

¹⁸ 《漢學研究》第 4 卷第 2 期，1986 年，77—80 頁。

¹⁹ 《出土文獻研究》第 8 輯，上海古籍出版社，2007 年，213—214 頁。

²⁰ 《俄藏敦煌文獻》第 7 冊，上海古籍出版社，1996 年，319—320 頁。

²¹ 榮新江《唐代西州的道教》，《敦煌吐魯番研究》第 4 卷，北京大學出版社，1999 年，139 頁。

²² 林世田、劉波《國圖藏西域出土〈觀世音菩薩勸攘災經〉研究》，《敦煌文獻·考古·藝術綜合研究——紀念向達先生誕辰 110 周年國際學術研討會論文集》，中華書局，2011 年，306—318 頁。

文獻的研究成果，其中有些和《敦煌學：第二個百年的研究視角與問題》直接或間接有關，故此一道評述。

此外，作為新世紀俄羅斯敦煌學的輝煌成就，還應當提到 2008 年艾爾米塔什博物館和東方文獻研究所為紀念亞洲博物館創建 190 周年而共同舉辦的“千佛洞：俄國在絲綢之路上的探險”（Caves of Thousand Buddhas. Russian Expeditions on the Silk Road）大型展覽，同時出版了《千佛洞：俄國在絲綢之路上的探險展覽圖錄》（*The Caves of One Thousand Buddhas. Russian Expeditions on the Silk Road. On the Occasion of 190 Years of the Asiatic Museum. Exhibition Catalogue. St. Petersburg: The State Hermitage Publishers, 2008*），彩色精印，非常華美。同年，配合這個大型展覽，出版了波波娃主編的《二十世紀轉折點時期俄國的中亞探險》（*Russian Expeditions to Central Asia at the Turn of the 20th Century, St. Petersburg: Slavia, 2008*），彙集 15 篇有關 19 世紀末、20 世紀初俄國各支探險隊的論文，也包括中、日、英、匈牙利學者對相關問題的討論。在高田時雄的推動下，這個展覽的部分陳列品移到日本京都，2009 年在京都國立博物館舉辦了“絲綢之路古文字巡禮——俄國探險隊收集文物”展覽，並且出版了同名的日文展覽目錄²³。上述《涅瓦河邊談敦煌》的日方作者基本上就是這本圖錄解說詞的撰稿人，他們的論文有的就是這次解說詞的延續。

最後還應當提到的是 2012 年莫斯科出版的波波娃主編《中亞的黨項：紀念克恰諾夫教授誕辰 80 周年論文集》（*Тангуты в Центральной Азии. Сборник статей в честь 80-летия профессора Е.И. Кычанова*）。書前是波波娃介紹克恰諾夫學術貢獻的文章《命運的安排》（3 頁）和《科恰諾夫學術論著目錄》（15 頁），隨後是學術論文 35 篇，作者包括俄羅斯、中國、日本等國學者。限於篇幅，不詳細介紹，只列其中俄國學者的論文目錄和開始頁碼²⁴：《俄國科學院東方文獻研究所典藏西夏資料研究的總結和前瞻》（58 頁），《〈掌中珠〉上的西夏植物：美麗的花與樹》（97 頁），《國立艾爾米塔什博物館收藏的西夏版畫插圖》（137 頁），《中亞早期游牧民族建國諸問題》（147 頁），《從考古和文獻史料談西夏政權的北方邊界》（154 頁），《中國與印度共同慶祝佛教節日》（186 頁），《〈天朝〉和早期鐵器時代騰格里（蒙古天神）的聖所：兼論中亞游牧民族宗教文化的可持續保護問題》（194 頁），《俄國科學院在西域考察中的作用》（262 頁），《關於女真語中的一些通古斯語語法痕跡》（279 頁），《四大系統構成唐朝法律體系》（313 頁），《黑水城出土繪畫中的西夏肖像》（342 頁），《十七世紀蒙古編年史中的“烏魯斯”》（383 頁），《〈字海〉指南》（412 頁），《黑水城考古发现重大意义》（481 頁）。

（2013-2-21 稿，原載《敦煌吐魯番研究》第 13 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3. 8, 563-578 頁）

²³ 京都國立博物館編《シルクロード文字を辿って——ロシア探検隊収集の文物》，京都國立博物館，2009 年。

²⁴ 感謝史睿幫忙翻譯。